

美国主流媒体视野中的中日历史认识问题

——以《纽约时报》(1980—2010年)为例

张绍铎 马洪喜

摘要 历史认识问题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是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个关键变量,而媒体舆论又是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背景因素。通过对30年间《纽约时报》中涉及中日历史议题的152篇新闻报道的梳理,分析美国主流媒体对中日历史认识问题的认知,对比考察不同时期中日两国在美国主流媒体中的形象,为中国在西方媒体视野中塑造更理想的国家形象提供参考。中国应从两个方面来主动塑造和传播积极的国家形象:中国作为国家形象的塑造主体应大力加强公共外交,全方位、多渠道地加强与国外公众的沟通与交流,澄清误解,汇聚共识,在对日态度上即使争取不到偏向中国立场的国际舆论环境,也要基本争取到相对客观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国作为国家形象塑造的客体在地区性和全球性的治理机制当中以负责任大国身份参与各种国际问题的解决,让国际社会大众从中国的实际行动中了解和认识中国,从而间接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中国要做国际舆论环境的主动塑造者。

关键词 中日关系;历史认识问题;媒体舆论;美国;国家形象

基金项目 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重点学科日语规划项目(XJZDXKRYZSD)

作者简介 张绍铎,1974年生,社会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副研究员(上海200083);马洪喜,1986年生,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上海200083)。

中图分类号 D829.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6198(2013)03-0165-06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无须赘述,但长期以来历史认识问题却成为横亘在两国政府和国民间的一个重要障碍。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日之间围绕历史问题发生的摩擦不断,如1982年6月发生的第一次教科书修改事件,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1986年再次发生了教科书问题,1996年桥本龙太郎首相再次参拜靖国神社,1996年与1997年又发生了关于新历史教科书的修订事件,2001年至2005年小泉纯一郎首相一再参拜靖国神社;⁽¹⁾2001年、2002年以及2004年又相继发生历史教科书修改事件。⁽²⁾以历史认识问题为核心的上述事件都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抗议和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毒化了中日关系。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自2002年开始做普通民众对日本认识的调查,截至2009年已完成四次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度很低(低于10%),对日本的恶感则很高(一般在50%以上)。中国民众对日恶感中最重要的成因就是历史认识问题。⁽³⁾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出发,美国因素在中日关系中举足轻重。提出对日新思维的时殷弘就主张,中

国应该从总体的战略角度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大力争取改善中日关系乃至实现中日接近,以便中国能够主要在中长期安全意义上尽可能集中应对美国实在和潜在的对华防范、压力与威胁,并集中致力于台湾问题上的阻独促统重任。⁽⁴⁾他是从对美战略高度来认识中日关系的,而日本的对华政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的影响和制约。日美同盟是日本对外政策中最重要的立足点。不论是对美“协调”派还是对美“自主”派掌权,冷战期间日本历届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时只有在美国允许的范围之内走得有多远的区别,而不存在突破美国允许范围的情况。⁽⁵⁾冷战后同样如此。

由此可见,我们研究中日关系,在关注两国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的同时,也不得不考虑美国因素。而对这两者之间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更加不可或缺了。

本文拟通过对《纽约时报》1980年至2010年间对中日历史认识问题相关报道的梳理和分析,考察该报对上述议题报道的变化趋势,分析其报道内容的特点和规律,从而揭示该报所反映出的中日两国形象的差异与变化,并分析这种差异和变化的原因。

在美国的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中,媒体对他国或国际事务的报道往往会在国内引起一定反响。无



论媒体的报道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公众的接受程度都很高。(6)美国媒体对中日双边关系的报道长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两国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从而影响政府决策者对两国关系的审视和定位。

除此之外,海外主流媒体涉及中国对外双边关系的报道,不仅可以折射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同时也为了解国际社会认识中国如何处理对外关系提供了依据。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力求使研究结论更为客观和准确。

1. 样本收集

a. 研究媒体的选定

《纽约时报》是当今美国乃至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发行量巨大,与英国的《泰晤士报》并称为报纸中的报纸,是美国的精英阶层乃至政府高层人物的必读报纸。(7)《纽约时报》是美国外交官和议员们的必读物,议员们在辩论中经常引用该报的信息。(8)

b. 时间范围的选定

20世纪80年代是中日关系逐步走出70年代蜜月阶段的关键时期,历史认识问题开始浮现,并在两国关系中投下越来越大的阴影。本文所需的样本数据来源于ProQuest公司的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数据库,其对《纽约时报》的收录始于1980年6月1日。同时为了考察长时期该报对议题报道变化规律的需要,本文所需数据的搜集止于2010年12月31日。

c. 样本单元的选取

在数据库中输入关键词Yasukuni、Japanese Textbook等词,获取样本共152篇,选词时力求简明、准确。

2. 分析项目建构

a. 议题报道总量分析

议题报道总量是指该报对中日相关议题在所设时间段内的总的报道量,通过对该项目的考察可看出该报总的报道走势情况,以从宏观的角度进一步分析该报对不同议题的关注度情况。

b. 样本单元的篇幅字数与报道类型

对样本单元篇幅字数与体裁的考察,是为了从广度与深度层面探讨该报对不同议题的微观分析,以进一步探索该报的报道特点与规律。

c. 消息来源地

对消息来源地的考察可反映媒体对新闻信息采集的客观性及其倾向性。

d. 报道态度

本文在分析媒体报道态度时借鉴了国内学者的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如罗以澄、叶晓华与付玲对“《人民日报》镜像下的美国国家形象建构”的研究。本文的报道态度指记者在写作时有意或无意地对报道对象流露出来的态度和表达的感情色彩,并且将报道态度分为肯定性报道、否定性报道、客观纪实性报道、褒扬性话语的纪实性报道、贬义性话语的纪实性报道等五个评判指标,以对《纽约时报》议题报道的态度倾向性进行分类。其中肯定性报道是指对议题持完全肯定的积极态度,如文中常常使用“合作”、“友好”、“积极”等使读者容易对报道对象产生美好联想的词汇;否定性报道是指对议题持完全否定的消极态度,使用“镇压”、“极权”、“迫害”等容易使读者对报道对象持批判目光的话语词汇;客观纪实性报道是指报道以不带感情色彩的词汇向读者介绍新闻事实,通常比较客观;褒扬性话语的纪实性报道是指报道语气以略带褒扬性色彩的纪实性报道为主,而贬义性话语的纪实性报道是指报道语气以略带贬义性色彩的纪实性报道为主,这两类文章看似采用客观的纪实性报道,实则通过对客观事实和叙事角度的选择巧妙地表达了记者的主观价值判断。

三、数据分类与量化

1. 《纽约时报》对中日历史议题报道总量分析

《纽约时报》对中日历史认识问题年篇幅报道量变化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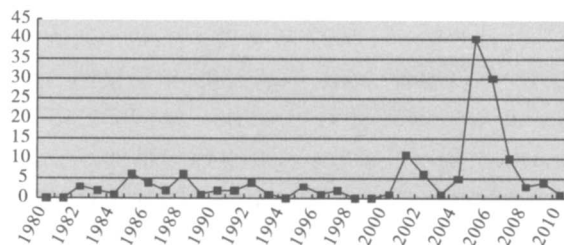


图1 《纽约时报》对中日历史认识议题报道的年篇幅报道量走势

如图1所示《纽约时报》对中日历史认识问题的平均年篇幅报道量在五篇左右,说明该报对中日历史问题关注度不高。图中的几个波峰点正对应了中日之间围绕历史问题而产生摩擦的时间,如1982年的波峰点代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围绕历史教科书修改事件所出现的双边摩擦,1985年



的波峰点代表的是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所引起的中日关系紧张 2001 年及 2005 年的波峰点反映了小泉首相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及历史教科书问题而引起的两国关系倒退。

2. 《纽约时报》对样本单元的篇幅字数与报道类型统计分析

《纽约时报》对样本单元的篇幅字数与报道类型统计如下:

表 1

500 字以内	500—1000 字之间	1000 字以上
43 篇	69 篇	40 篇
28.29%	45.39%	26.32%

表 2

消息	评论	简报	读者来信
114	28	5	5
75%	18.42%	3.29%	3.29%

如表 1 所示,报道字数在 500—1000 的新闻最多,占近一半,1000 字以上的报道比例较小。如表 2 所示,《纽约时报》对中日历史议题的报道主要以相对浅显的消息稿为主,相对更有深度的评论只有 18.42%。由此可见,《纽约时报》对中日历史议题的报道以浅层次的陈述性报道为主,缺乏深层次的调查与分析性报道。

3. 《纽约时报》对中日历史议题报道的消息来源地统计

如图 2 所示,《纽约时报》对中日历史议题报道的信息源首选日本,来自日本的信息源数量是来自中国信息源数量的四倍。一般来讲,信息源的不平衡会影响到报道中的倾向性。《纽约时报》对中日之间历史议题的报道在信息源的选择上大幅度倾向日本,会不可避免地更多地反映日方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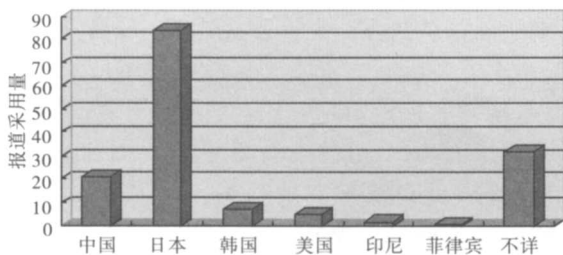


图 2 议题报道的消息来源地统计

4. 《纽约时报》对中日历史议题报道的态度倾向性统计

如图 3 所示,报道态度呈现客观纪实性的样本 77 篇,占报道总量的一半,稍多于贬义性话语的纪

实性报道。这反映美国媒体在新闻理念上以“反常性”作为选择新闻的主要标准,(9)对中日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更多地采取了不置可否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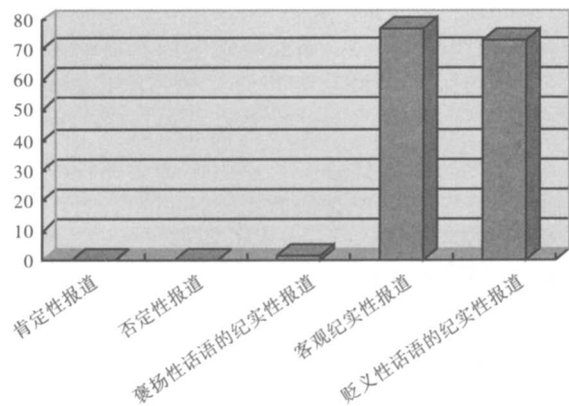


图 3 《纽约时报》对中日历史议题报道的态度倾向性统计

四、《纽约时报》对中日历史议题报道的内容分析

1. 议题一:从国内政治的角度解读靖国神社参拜问题

1980—2010 年,日本首相及部分国会议员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了以中国为首的亚洲邻国的不满和抗议,成为中日两国间历史认识问题上主要的表现形式。《纽约时报》同样认识到这一点,并分别从两国国内政治的角度解读靖国神社问题。

就日本的国内政治而言,退伍老兵与遗族会是日本极端右翼势力的中坚,在日本政坛拥有一定的影响力,执政党(主要是自民党)在国内政治选举时需要考虑右翼势力的选票,或者说为换取后者对其它议题的支持而在靖国神社参拜问题上向右翼势力妥协,即日本执政党将靖国神社参拜问题作为选举的一个政治筹码。(10)

就中国国内政治而言,该报认为,中国通过打“历史牌”以获取“经济红利”。在该报看来,20 世纪 80 年代中日双边关系处于稳定发展期,但处于经济改革起步阶段的中国面临的经济情况并不乐观,尤其是缺乏经济现代化所亟需的资金和技术,并且 80 年代初期中国对日经济贸易逆差严重,因此《纽约时报》煞有介事地声称,中国有意利用与日本之间存在的历史问题作为国际政治谈判的筹码来换取“经济红利”——日本的对外经济发展援助。(11)

除此之外,在该报看来中国打“历史牌”的另一目的是间接获取政治效益。该报的解读称,中国共产党为了巩固政权的稳定以及加强共产党执政



的合法性 利用与日本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作为巩固国内政治稳定的筹码,在国内大力实施爱国主义教育,培育国民的“抗日民族感情”,以转移国内民众对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及贫富差距日益悬殊化等问题的注意力,借此凝聚国内日益松散的意识形态,以求维护社会的稳定。(12)在日本也有与之遥相呼应的观点,毛里和子在分析战后中日关系的论著中提到,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各种冲击的时候,让国民从什么地方求得认同呢?对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就只有民族主义即爱国主义了。(13)在国际政治领域,该报还声称中国借历史问题间接“阻挠”日本急欲获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努力,破坏日本对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尝试。(14)

通过以上解读不难看出,《纽约时报》是戴着有色眼镜解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治国理念与中国国民的爱国主义感情的,中国国民的爱国主义情感爆发出于对日本右翼势力极力扭曲历史事实的自觉反应,是对日本意欲篡改历史的不满。中日国民之间情绪矛盾的激化,追根溯源是由日本一些不负历史责任的势力引起的,《纽约时报》没有透彻地分析事件的原委,并认为中国国民的爱国主义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实为毫无道理的谬指。

通过对样本单元的内容资料分析还可了解到,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并不仅是日本与亚洲邻国之间的历史问题,美日之间也存在关于二战的历史记忆问题。据该报解读,二战后期美国不得不对日本实施了贸易禁运政策,日本破釜沉舟先发制人突袭珍珠港美军基地。珍珠港事件成了美国民众心中的二战历史“疮疤”。(15)美国民众对二战期间日军虐待盟军战俘的“巴丹死亡行军”的历史记忆同样挥之不去。(16)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及长崎投下的原子弹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原爆”的历史记忆成了日本民众心中的二战历史“疮疤”。(17)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及主导制订的日本宪法也在日本民众心里留下了战败的阴影。此类事件成为美日之间的历史记忆症结所在。

但是通过对议题内容的相关比较分析可知美日之间的历史记忆问题并不像日本与亚洲邻国之间那样表现得白热化。究其原因不难从样本单元的内容分析中得到解答。靖国神社中摆放了突袭美国珍珠港以及应为巴丹死亡行军负主要责任的日本军事将领的牌位,这个客观事实的存在也是令美国政府感到“头疼心烦”的事,但是在冷战时期,美国为了对外战略上的需要以实现在亚太地区

“遏共反共”的战略目标,对于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采取了不置可否的立场。对于美国来说,日本具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与边缘性的次要国家利益相比,战略性的国家利益更加重要。

美国采取这样的立场还有一个因素的考量,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另一个战略同盟伙伴韩国。虽然日本与韩国都是美国的战略同盟伙伴,理论上说美日韩在战略上相互合作与协调是美国所期盼的理想状态,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日韩之间所存在的历史问题使美国构造的美日韩三国同盟关系所起的效用大打折扣。因此美国为了维护微妙复杂的美日韩三国关系,对日本与亚洲邻国之间所存在的历史问题采取了“不干预”的政策。(18)就如同样本单元所解读的那样,一旦美国插手日本与邻国之间的历史问题,则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问题将变得更加棘手。(19)这也同时印证了前文在数据分析过程中所得出的结论,即《纽约时报》对中日历史议题的关注度低并且报道话语感情色彩较淡。

2. 议题二:历史教科书中涉及到的篡改内容

《纽约时报》对历史教科书事件的报道,不仅涉及到中国与日本,而且几乎同时涉及到日本对朝鲜半岛、东南亚国家以及与美国之间的二战历史事实的篡改。如关于日本二战时期对中国东北、台湾的占领以及对南京大屠杀等多个历史事件的扭曲性涂改;关于对朝鲜半岛从1910年至1945年的殖民占领、对朝鲜半岛人民的强迫劳役以及所涉及到的二战时期的慰安妇等历史问题的曲解性的阐释;对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则将责任归咎于美国,认为美国为了转移20世纪30年代的国内经济大萧条对日本实施贸易禁运的政策,才逼迫日本发动了“自卫性”的太平洋战争,正是通过战争美国才在二战结束之后实现了经济腾飞;对于东南亚其他国家,日本的扭曲性解释是,正是日本“帮助”了东南亚国家从西方列强的殖民占领中“解放”了出来,是积极“推动”了亚太地区的殖民解放。(20)

《纽约时报》对日本右翼势力试图篡改历史教科书的报道,缺乏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主流媒体与美国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对日本的迁就是一脉相承的。

3. 议题三:日本国内不同党派集团对二战历史认识不一

通过对样本单元的内容梳理,日本国内对二战历史的认识始终存在两大派别,一是日本国内左翼倾向的党派及经济利益集团,更趋向于正视历史并



9 771001 619003

且敦促和支持日本政府承认并直面日本犯下的历史罪行,这一派别的团体认为日本应将中国看做经济伙伴,将中国的发展崛起看做日本的机遇,他们强调的是中日之间与日俱增的经济相互依赖性;二是日本国内的右翼保守势力集团及遗族会成员,怀有否认乃至美化历史罪行的意图,时常向政府施加压力敦促日本首相及国会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企图修改日本关于二战历史的教科书。⁽²¹⁾该派别将崛起的中国看做是日本国际政治权力的竞争敌手,大力喧嚷中国强大的实力存在是对日本乃至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威胁与军事威胁。

《纽约时报》清晰地地区分了日本国内左右两大阵营在历史认识问题和对华认识问题上倾向性,但忽略了无论在冷战中还是在冷战后左翼阵营一直是日本国内政治中的少数派,冷战后更急剧萎缩,在日本国内政治中的影响力日渐微弱。其中有日本国内政治的内在发展逻辑,但与战后美国政府对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的姑息纵容乃至扶植利用是分不开的。

4. 议题四:中日历史问题的“连锁”效用

《纽约时报》在报道中日历史议题的过程中,不免谈及中日之间的其他不和谐因素,如东海领土争端、对能源资源的争夺、对军事目的的互相猜疑以及对亚太地区国际政治影响力的竞争等。⁽²²⁾值得注意的是,通过纵向总体分析30多年内的样本单元,能发现中国与日本在美国媒体视野中形象变化差异的端倪。20世纪80年代,中国与日本处于友好稳定发展时期,日本向中国提供经贸领域的援助以帮助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这个时期的中国在《纽约时报》中呈现的是“政治大国,经济小国”的形象,与此相反日本呈现的是“经济大国,政治小国”的形象。“经济大国”日本,不断援助亚洲邻国发展经济,“政治大国”中国则表现得像“无赖国家”,以历史认识问题为“借口”向日本施加压力,从而获取更多的经济援助。这种形象对比,不但无视中日历史认识问题的根源,而且妄然揣度中国就历史认识问题向日本严正交涉的立场。中国自古就有“不受嗟来之食”的传统,况且中国也并非日本对华经济援助的唯一获益方,日本也从中获益颇多:中国在抗衡苏联减轻日本压力方面发挥的作用难以衡量,日本产品在中国市场收获了超高的知名度和良好的信誉。

20世纪90年代,《纽约时报》对中日历史问题的关注度处于这30多年的最低潮,在此期间内该报视野中的中日形象并没有太大变化,中国仍然还

是大力发展经济,虽然中日之间历史问题时有发生,但是中日经贸合作却在不断加深。但是从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的10年,该报视野中的中日形象与上个世纪相比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在该报视野中,中国的迅速崛起构成了对日本的威胁,中国强大的力量存在构成了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潜在破坏性因素,而与此相反,日本在美国媒体视野中却呈现出与中国相反的形象,昔日辉煌的日本今日却在盛气凌人的中国面前敢怒不敢言,成为被强大的中国所欺凌的弱小国家。

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与冷战后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的巨大变化相关,更与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相关,然而最为关键的还是《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反映出的西方社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不断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与相对停滞的资本主义盟友日本,前者当然是更具威胁性的,后者自然更需要同情和帮助。

五、媒体舆论与双边关系研究的启示

“国家形象”的重要性在全球化时代更加凸显,已经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损害国家形象,实际上就是损害国家利益。⁽²³⁾中国正努力从各个领域加强其在国际社会上国家形象的塑造,让世界更好地了解、认识中国。这的确有益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但是这种塑造毕竟是中国作为一个主体主动的有目的的单向形象传播,与国际主流媒体透过中国处理对外关系中的具体行为中捕捉到的国家形象相比,在第三者看来,后者所映射的中国国家形象比前者可能更具有可信度与说服力。因为公众对一个国家的对外宣传很敏感,有宣传色彩的信息有时候不但不能为国家形象加分,而且还容易适得其反,损害国家的声誉。⁽²⁴⁾

中国应从两个方面来主动塑造和传播积极的国家形象。一方面,中国作为国家形象的塑造主体应大力加强公共外交,全方面、多渠道地加强与国外公众的沟通与交流,澄清误解,汇聚共识。比如在对日态度上即使争取不到偏向中国立场的国际舆论环境,也要基本争取到相对客观的国际舆论环境。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国家形象塑造的客体在地区性和全球性的治理机制当中以负责任大国身份参与各种国际问题的解决,让国际社会大众从中国的实际行动中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从而间接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中国要做国际舆论环境的主动塑造者,在多元化的舆论环境中以务实开放的心态,积极看待海外媒体中负面的中国形象,正视问



题的原因 积极应对复杂的挑战,向国际公众塑造与展示中国的真实形象,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争取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参考文献)

(1) [13] 毛里和子《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07-160、73页。

(2) 高兰《冷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思想与实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123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第一次中日舆论调查(2002年9—10月)》,《日本学刊》2002年第6期;蒋立峰《中国民众对日本很少有亲近感——第一次中日舆论调查结果分析》,《日本学刊》2002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第二次中日舆论调查(2004年9—10月)》,《日本学刊》2004年第6期;蒋立峰《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不亲近感显著增强》,《日本学刊》2004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第三次中日舆论调查(2006年9—10月)》,《日本学刊》2006年第6期;蒋立峰《培育两国人民的亲近感对巩固中日友好的根基意义重大》,《日本学刊》2006年第6期;王伟《第四次中日舆论调查报告——培育中日两国民众亲近感任重道远》,《日本学刊》2009年第2期。

(4) 时殷弘《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

(5) 添谷芳秀《日本外交与中国(1945—1972)》,庆应义塾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55-260页。

(6) 韩召颖编著《美国政治与对外政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07页。

(7) 李瑛、何力《全球新闻传播发展史略》,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8-105页;刘勇《大追寻:美国媒体前沿报告》,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8) 夏尔—菲利普·戴维、路易·巴尔塔扎、于斯丹·瓦伊斯:《美国对外政策:基础、主体与形成》,钟震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77页。

(9) 郭可、吴瑛《世博会对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作用》,《外交评论》2010年第6期。

(10) Sterngold and James, “Japan Ministers Visit War Shrine,”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6, 1992; Reuters, “Koizumi’s Visit to War Shrine Angers Japan’s Neighbors,” April 22, 2002; Raymond Bonner and Norimitsu Onishi, “China and Japan Leaders Pledge to Improve Relations,” April 24, 2005.

(11) Haberman and Clyde, “Japan Smooths Over Its Imperial Past,” September 2, 1984; John F. Burns, “War’s End Stirs Memories in China,” August 20, 1985; Clyde Haberman, “Nakasone, In Effort

To Quell Furor Skips War Shrine Again” January 10, 1986.

(12) Gary J. Bass, “A Shrine to Japan’s Tainted Past” August 5, 2006.

(14) Norimitsu Onishi, “U. S. Needs Japan’s Diplomacy, but Tokyo Isn’t Talking” June 25, 2006.

(15) Clyde Haberman, “Tokyo, 40 Years Later: War Dead Are Honored” August 16, 1985.

(16) Weisman and Steven R, “Japanese Apology Over War Unlikely After Bush’s Stand” December 6, 1991.

(17) Clyde Haberman, “Tokyo, 40 Years Later: War Dead Are Honored” August 16, 1985; Nicholas D. Kristof, “The World: Why Japan Hasn’t Said That Word” May 7, 1995; Norimitsu Onishi, “Ad Man – Turned – Priest Tackles His Hardest Sales Job” February 12, 2005.

(18) Norimitsu Onishi, “U. S. Needs Japan’s Diplomacy, but Tokyo Isn’t Talking” June 25, 2006.

(19) John F. Burns, “China Criticizes Japan On Visit To War Shrine” August 25, 1985.

Sanger and David E, “Coloring History Our Way” July 2, 1995; Howard W. French, “Koizumi’s Visit to War Shrine Angers Japan’s Neighbors” April 22, 2002; Norimitsu Onishi, “Tokyo Protests Anti – Japan Rallies in China” April 11, 2005.

(20) John F. Burns, “China Criticizes Japan On Visit To War Shrine” August 25, 1985; Sanger and David E, “Coloring History Our Way” July 2, 1995; Howard W. French, “Koizumi’s Visit to War Shrine Angers Japan’s Neighbors” April 22, 2002; Norimitsu Onishi, “Tokyo Protests Anti – Japan Rallies in China” April 11, 2005.

(21) Clyde Haberman, “Japan’s Education Chief Gets Lesson In Diplomacy” September 10, 1986; Howard W. French, “Koizumi’s Visit to War Shrine Angers Japan’s Neighbors” April 22, 2002; Norimitsu Onishi, “The Japan – China Stew: Sweet and Sour” January 19, 2005.

(22) Reuters, “Japan and China Take Steps to Bolster Ties” April 11, 2007; Norimitsu Onishi, “China and Japan in Delicate Minuet To Ease Deep Diplomatic Tensions” April 12, 2007.

(23) 乔舒亚·库珀·雷默等《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沈晓雷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序言,第1页。

(24) 约瑟夫·奈《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16-117页。

【责任编辑:赵宏翔】

